

“第三条道路”社会福利思想主张的发展*

丁建定 裴默涵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4)

摘要:“第三条道路”出现于 20 世纪初的英国,发展于 20 世纪中期的德国,兴盛于 20 世纪末的英国,并扩展到大部分的西方国家。尽管西方各国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与实践存在国别特色,但是它们都持有如下基本主张:放弃传统单一的极端保守性或激进性政策选择;实行介于两者之间的调和性政策选择;强调有限的国家干预与有限的市场调节相结合,社会福利中国家责任、社会责任与个人责任的平衡,以及社会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等。“第三条道路”社会福利思想对大部分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乃至全球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产生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第三条道路”;社会市场经济;积极福利;第二代福利

“第三条道路”也被称为“中间道路”,是 20 世纪末期以来兴盛于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潮。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第三条道路”早在 20 世纪初的英国社会就已出现,20 世纪 30 年代以麦克米伦的思想为代表的“中间道路”思想又有所发展。20 世纪 60 年代,以艾哈德为代表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思想理论是“第三条道路”的典型代表,并将“第三条道路”思潮推进一步。20 世纪末,以吉登斯为代表的英国“第三条道路”思潮开始凸显,并通过布莱尔及其工党政府的措施走向兴盛,成为 20 世纪末以来影响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潮。

一、麦克米伦与英国“中间道路”社会福利思想的出现

早在 20 世纪初,英国已经出现了第三条道路的思想主张。1911 年,英国保守党中的激进派建立了“保守党社会改革委员会”,在一份题目为《国家托利主义与社会改革》的文件中,该委员会主席史密斯阐述了委员会的基本原则。他说,人们指责保守党统一派的社会政策是自由党社会政策与原则的翻版,恰恰相反,托利党的社会改革既不同于劳合·乔治的“激进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辉格党的“个人主义”,而是“第三条道路”。激进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对立的原则,导致阶级之间产生仇恨。国家托利主义的原则是实用主义的,只关心“生活本身的事实”,因此,它不仅不会带来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强调在一种高度统一体下阶级利益的调和^[1]。这是“第三条道路”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早期情况。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是英国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在经济上,经济危机不断爆发,经济衰退导致的失业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对英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刚刚建立起来的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不断加剧的社会问题面前显得极为脆弱。在政治上,自由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衰落,而工党力量增长,后者代替前者成为英国第二大党,由此,英国政治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的各项社会政策发生明显的对立。在严重的经济社会现实面前,以工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派别主张建立公有制,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长期以来在英国形成的自由资本主义传统依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如此一来,在英国就形成了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即主张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道路与主张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发展的直接结果是,

* 本文系 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史(多卷本)”的研究成果,项目号为 19ZDA234。

英国政治与社会经济理论出现了所谓的“中间道路”。

主张“中间道路”的思想家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具有很大优越性的社会制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也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失业问题、贫困问题等。这些问题如不及时加以解决,必将危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因此,必须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必要的改革,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将成为主要的改革措施。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人道主义的基本需要,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需要。合理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改善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发展环境,增强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内在力量。从范围到性质,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措施都不能损害个人的能动性以及家庭的责任,人们首先应该承担义务,然后才能享受社会权利。社会保障与福利应该鼓励而不是妨碍私人志愿性福利与保障作用的发挥,应该以争取实现最低生活标准为主,而不应该以降低社会不平等为主。绝对贫困是一种必须铲除的毒瘤,而不平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社会上不存在不平等,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就减弱了^[2]。

麦克米伦是这一时期英国“中间道路”思想的代表。他在1932年明确指出,除了实行一种有计划的经济以外别无选择。1933年,麦克米伦出版了《重建:对一种国家性政策的要求》一书,提出实行国家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干预,主张建立一种混合性经济。1938年,麦克米伦的《中间道路》一书出版,指出英国正面临经济衰退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严重威胁,但是,英国的政治家们太迷恋于自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道路之争,没有认识到这些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必须避开两条道路之争,通过实行混合经济政策,实现充分就业,推动社会改革,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一种不低于最低生活标准的生活水平”。为实现这一目标,麦克米伦主张制订最低工资法,实行儿童补贴以及国家营养标准,甚至主张由国家为有需要者提供住房、生活用电与燃料。他认为,这种对基本生活水平的保障是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首要一步。

麦克米伦主张必须实施国家性社会政策,但他并没有否定私人与志愿性社会保障的作用。他指出,既然国家应该充分发挥其对经济的干预职能,以实现充分就业与最低生活标准,那么,社会也就没有理由不依靠私人与志愿性社会保障。可见,麦克米伦虽然主张社会保障制度领域中的国家控制,但他并不主张国家对社会与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方面实行控制^[3]。英国早期“中间道路”社会福利思想,对20世纪初期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在当时还十分有限。

二、艾哈德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社会福利思想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德国社会经济遭受沉重打击,统制型经济体制的结果是战后德国陷于极端严重的经济困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社会在对法西斯政治体制进行清算的同时,开始反思高度统制型的经济政策。正如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著名代表艾哈德所指出那样:“20年代和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德国的专制经济政策形式为少数几位经济学家提供了机遇,使他们能够用新问题向周围现实提出挑战。通过研究历史或者重新深入地钻研理论,德国的思想家们几乎各自独立地同时产生了一种新经济政策理论基础。……缪勒·阿尔马克在他写的《统制经济与市场经济》一书中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构想^[4]。”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是由著名经济学家阿尔马克在1946—1948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提出的。他认为,社会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种秩序政策思想,其目标是在竞争的基础上把自由主动精神与通过市场经济成就得到保证的社会进步结合起来。1949年,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通过的纲领指出,社会市场经济是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经济法典,按照这一法典的基本精神,自由和有作为的人所创造的成就,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所有人对经济利益和社会公正的要求^[5]。

艾哈德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著名理论家,他十分强调经济发展的社会目标,以及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协调。他指出,市场经济的社会意义在于,任何经济成果、任何从合理化中得到的好处及任何工作效率的提高都应该有益于全民的福利^[6]。关于社会经济与社会福利的关系,艾哈德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福利发展的基础。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加福利,远比通过无益地争论用不同方法分配国民生产总值来谋求社会福利更为有效。发展国民经济的所有力量都要用于增加国民经济的收益,而不要在收入分配战中耗费时间,

为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尽可能多地分到“一块蛋糕”，必须尽可能地将“蛋糕”做大。全力发展社会经济就能够使所有并非由于个人原因而不能直接参加社会生产过程的人们，都会得到合理而相称的生活水平，也只有经济发展才能够使穷人越来越多地得到福利。经济成果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只有发达的经济才能提供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先要创造出国民生产总值，后才有分配^[7]。

关于集体福利与福利国家，艾哈德指出，一些人幻想，人的快乐和幸福建立在集体的总责任之上，并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直到走向依靠被认为是万能的国家，这种思想明显反映在福利国家的构想中。但是，如果我们越来越委身于某种形式的集体生活，没有人再愿意对自己承担责任，而且每个人都想在集体中得到保障。那么，我们将走向何处？我们将如何保持进步？这种思想正把我们推向福利国家，只会给我们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种思想与倾向将比任何其他东西更加容易逐渐扼杀勇于负责、博爱精神与自力更生等真正的优良品德。如果这种思想的“瘟疫”蔓延开来，我们势必滑向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对这种危险必须坚决予以回击”^[8]。艾哈德还认为，集体性社会福利必须具有一定的限度。正像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消费不能超过自己所创造的价值一样，每个人所能得到的保障也不能超过我们全体成员通过生产而获得的保障，正是社会福利方面过分的集体摊派，使得个人过多地依赖于国家与集体福利，这已经给社会带来巨大的代价^[9]。

艾哈德据此对强制性社会保险制度提出批评。他指出，经济自由与完全强制性社会保险是水火不相容的。以强迫为基础的普遍的国民保险（不论是按照一个标准还是分门别类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与普遍的国民供给制度最多只在形式与程度上有所差异，并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如果这种国家强制保险超出了急需保护的人的范围，国家还要迫使那些从经济生活与职业生活地位来看根本不需要这种强制性保险的人也接受保险，就有了走向福利国家的趋势^[10]。在评价社会保险时应该注意，在过去几十年中，不仅经济发展的方式与原则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政策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个人与家庭有能力提供自我保障时，国家提供的强制性保障就应该或者必须停止。一些公民完全有条件依靠自己的能力与劳动进行自我保障，如果还要把这些人拉进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制度之中，对社会政策与社会生活都是极其不利的。因此，艾哈德还指出，集体性社会福利的范围宁可窄一点，也不要宽一点。政府与社会的天职之一是保障老人的晚年生活，他们损失个人储蓄是由于错误的经济政策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并非出于个人原因。老工人与老职员都必须同样得到帮助，此外，受助者还应包括自由职业者、独立劳动者等。但是，德国的特殊情况所产生的这个特殊问题不应该引起错误的想法，那就是好像强制性保险与集体福利天生就是符合这些范围的人的要求^[11]。

关于社会福利中的个人责任，艾哈德指出，集体福利不利于个人自立意识与进取精神的发展。如果社会政策的目的在于使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得到全部社会保障，绝对没有任何社会风险，我们就不可能希望他们的精力、才干、创业精神与其他优秀品质得到充分发挥，而这些品质对于民族生存与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艾哈德还将竞争概念引入社会福利领域。他认为，争取和保障各项福利的最有成效的手段就是竞争，用这种方法就能最佳地增加福利，“‘属于大众的福利’和‘来自竞争的福利’这两句口号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第一句表示目的，第二句表示到达目的途径”^[12]。

艾哈德还极力提倡个人自助的作用与地位。他指出“我所理解的中产阶级，无外乎这样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出于自身的责任感准备用自己的劳动来保障自己的生存。中产阶级具备的价值标准是：对自己命运的自我责任心，独立生存，并且用自己的劳动坚持到底的勇气。”自愿、自由并自我负责地克服生活风险，是自由经济与社会制度中独立生存的必要前提。在市场经济中，独立自主意味着从自我动力和责任出发从事独立职业活动，这种独立职业活动不仅要尽可能捕捉经济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必须承担由此带来的经济风险。因此，必须要求经济和社会制度中的独立职业者对社会生活风险自我负责。在自由经济制度中，既给每个公民独立活动与独立生存的机会，又通过国家强制措施减轻他们个人生活的独立责任，这样的做法是自相矛盾的，也是不负责任的^[13]。艾哈德还强调指出“社会保障当然是好事，也是十分需要的，但是社会保障必须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劳动和自己的努力得来的。社会保障不等于全民的社会保险、不等于将个

人的责任转嫁给任何一个集体。开始时必须实行个人自己负责,只有当个人负责还嫌不足或者必须停止时,国家和社会的义务才发挥作用^[14]。”

此外,艾哈德承认适当的社会福利可以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并主张政府应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合理发展。他指出,任何一种经济制度的最终目的,是要把人们从物质匮乏中解放出来,我们越是成功地增加社会福利,人们就会越少地沦入利己主义。只有社会福利的增加,才有可能使人们摆脱原始的利己主义思维,只要人们为日常生活发愁并在穷困中不能自拔,那就只能被利己主义思想所束缚。通过社会福利所带来的社会安全感,人们才有希望认识自我、人格与尊严,也才有希望从利己主义中被解放出来。随着社会生活有了保障,人们才会更好地区别真善美与假恶丑。艾哈德进一步指出,只要经济发展得到改善生活的愿望与提高生产的积极性的支撑,这种经济发展就是完全和谐的。但是,如果经济发展的意愿带来一种危险,即人们不顾国民经济生产能力,索取高于国民经济所能给予的东西,这样的经济发展就缺乏道德基础。一心想提高自己的劳动效益同时又想减少劳动量,不考虑生产率的实际可能性,这种想法与正常的经济发展意愿是不相符的。他认为,我们可以有耐心和信心地发展和扩大社会福利,因为今天暂时表现为滥用的现象同时也播下了健康的种子,关键在于我们要以事实证明,我们配得上享受富有成效与和平的劳动所带来的幸福和收获^[15]。

三、吉登斯与英国“第三条道路”社会福利思想的兴盛

20世纪末以来,随着英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再次面临重要的道路选择,传统的左派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与右派资本主义道路在改革实践中已被证实都难以独立成为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道路选择。于是,“第三条道路”社会福利思想重新受到关注,并逐渐成为影响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思想。其中,吉登斯成为英国新时期“中间道路”社会福利思想的主要代表。

其一,吉登斯提出了“无责任即无权利”的思想。他指出,政府对其公民负有一系列的责任,但是,传统左派往往倾向于将权利作为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种种要求。个人主义在不断扩张的同时,个人义务也应该不断延伸,领取失业救济的人应当履行主动寻找工作的义务,能否确保各种福利制度不会阻碍主动求职行为则取决于政府。作为一项伦理原则,无责任即无权利不仅必须适用于福利制度的受益者,也应该适用于每一个人。我们不应该把福利国家的改革简单地理解为营造一张安全大网,只有造福于大多数人的福利制度才能产生一种公民的共同道德。如果福利只具有一种消极内涵,并主要面向穷人,它就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吉登斯还指出,“第三条道路”应当接受右派对福利国家提出的某些批评。现在,这种依赖于自上而下的福利分配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很不民主的,它的主要动机是保护和照顾,但是,它没有给个人自由留下足够的空间,某些类型的福利机构是官僚化和没有效率的,有可能违背福利制度最初设计者的愿望。不过,吉登斯也明确指出,“第三条道路”并不把这些问题看成是应该剔除福利国家的信号,而是把它们视为重建福利国家的理由^[16]。

其二,吉登斯提出了“积极福利”的主张。他指出,福利制度一经建立便形成一套具有自身逻辑的自主系统,不管能否达到设计者所期望的目标。这样,人们的预期就被锁定,相关的利益集团就得到保护,这些制度性问题的积累本身就是需要进行改革的一种征兆,而正是因为存在一种由福利系统本身创造出来的并且受其保护的利益集团,福利制度改革不是那么容易实现。但是,为福利国家制定一项激进的改革纲领却是可以做到的。吉登斯认为,福利改革应该注意的是,有效的风险管理并不意味着减小风险或者保护人们免受风险影响,还意味着利用风险的积极一面,并为风险承担提供必要的资源,这种风险承担往往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有利的。吉登斯进一步指出,我们应当倡导一种积极的福利,公民个人以及政府以外的其他机构也应当为这种福利做出贡献,它将有助于财富的创造。福利在本质上不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它关乎人们的幸福。因此,经济上的利益或好处本身几乎从来都不足以创造出幸福。这不仅意味着种种其他情景和影响产生了福利,而且表明,福利制度必须在关注经济利益的同时关注心理利益的培育^[17]。

其三,吉登斯提出了“社会投资国家”的概念。吉登斯指出,为了取代“福利国家”这个概念,我们应当提出“社会投资国家”这个概念,它适用于推行积极福利政策的社会。社会投资国家具有以下特点。首先,作为积极福利的福利开支不再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和其他各种机构共同合作来提供,福利社会不仅仅是国家,还延伸到国家之上和国家之下。其次,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自主与自我发展将成为重中之重,社会福利制度不仅关注富人更关注穷人。再次,自上而下分配福利资金的做法应当让位于更加地方化的分配体制。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福利供给的重组应当与积极发展公民社会结合起来。最后,社会保障观念要发生积极的变化。在养老金制度方面,我们应当逐步废除固定的退休年龄,把老人视为一种资源而不是一种负担,退休年龄和养老金领取者等都是福利国家发明的,这些概念不仅与新的老龄化现实难以保持一致,而且明显地体现出依赖福利的色彩。在失业问题方面,失业福利支出应当维持适当的标准,并且主要用于人力资源的投资方面^[18]。

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福利主张直接影响了英国工党政治领袖布莱尔的思想。布莱尔指出,50年前的福利国家无法满足今天的需要。我们面临一些非常困难的抉择——譬如养老金、子女补助、健康和教育。我们必须显示我们处理和重新思索这些问题的勇气,以使福利制度能真正改善人们的生活,而不是加重人民的依赖性^[19]。布莱尔还指出,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自1945年以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现在却面临困境,它没能有效地缓解贫困,也没能帮助贫困者尽快走向独立,也没有实现它最初出现时的原则。自贝弗利奇报告发表以来,英国社会现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保障制度理应进行改革。世界变了,福利国家也应随之变化。救济受益者需要并应该得到更好而不是更多的救济,从而有助于摆脱对这些救济的依赖。福利应是指在这个变化着的世界中的机会和安全。它帮助人们继续前进和奋发向上^[20]。

布莱尔提出了“第二代福利”的观点。他指出“我想要建立第二代福利。”这种社会福利制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第二代福利是要给人以扶持,而不仅仅是施舍。它意味着多种服务,而不仅仅是现金,具体包括子女抚养和子女补贴、培训和失业救济金、老年赡养和养老金。福利应成为成功的跳板,而不是缓解措施失败后的安全网。它应当创造稳定,使家庭和社会团体能够应付这个变化的世界。第二,第二代福利能够适应家庭生活方式的改变。在这种家庭生活里,工作和照料孩子由夫妻共同承担,其退休时间长达二三十年。社会福利必须使这种改变朝好的方向发展,用安全感来代替恐惧感。第三,第二代福利承认,公民身份是建立在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第四,第二代福利不会通过高高在上的政府来发号施令,而是鼓励地方决策,鼓励公共或私人开展合作,以及鼓励地方人民采取革新措施。第五,第二代福利是要消除英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不安全感和低等收入阶层的贫困^[21]。可见,布莱尔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基本主张是:实现社会保障有效性的办法,不是无限制增加社会保障津贴,而是将个人与社会责任结合起来,不是减少社会保障项目,而是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实际效果。

布莱尔还就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关于养老金,他指出“我们的首要任务一直是而且仍然是消除养老金领取者的贫穷。我们理所当然地不赞成对基本养老金进行经济情况调查,而且会继续这样做下去。我们一直相信,基本养老金是所有人退休后继续发展的基础。工党有义务建立一个面向所有人的国家基本养老金。”他还指出,设立一笔养老保证金,以便在可控制的费用下提供较高的养老金,这的确是一种办法,但是,必须证明它是否行之有效,然后才能决定是否推行这一办法。应与收入相联系的国家养老金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的人^[22]。关于失业,他指出,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仅靠对失业者提供救济是十分不够的,必须采取下列措施:(1)为年轻失业者提供教育、就业和社区措施,通过议会立法来减少年轻人失业;(2)通过福利改革为失业家庭提供希望,这些家庭都陷入了为不复存在的旧劳动市场和家庭结构而设计的福利制度的陷阱之中;(3)为那些需要就业咨询、儿童看护和培训的单亲家庭提供职业、教育和培训计划;(4)逐步发放地方政府掌管资金以提供就业^[23]。关于最低工资,他认为,全国性最低工资制当然应该成为如今劳动力市场中一条至关重要的规定。有了最低工资,纳税人就不用再通过家庭信贷的方式对低工资实行补贴,最低工资还能减少雇员跳槽,促进培训投资,并有助于激发雇员的积极性。

工党应该把建立最低工资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24]。关于国民保健服务,他指出,国民保健服务制度应该是一种真正为全体国民健康负责的制度,其基本宗旨应该包括以下要点:(1)国民保健服务制度应该能够确保国民的身体健康;(2)应该改革而不是推翻国民保健服务制度;(3)努力做到对国民保健服务资源的有效利用,避免浪费与无效利用;(4)国民保健服务制度必须为适应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改进;(5)国民保健服务制度必须能够为所有患者提供便利的医疗保健服务^[25]。

四、施罗德等与“中间道路”社会福利思想在西方的扩张

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强调通过集体斗争捍卫自身利益的传统工人阶级的数量正在减少,而强调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中产阶级数量快速增长,并在西方经济与政治生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对传统的极端政治表示不满。对此,西方国家的各种政治派别必须调整自己的理论和政策,以吸引中产阶级的兴趣和支持。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带来诸如生态环境、饥饿与贫困、民族与种族分歧、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移民与难民潮、国际金融危机等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新的思路与理论及新的政策与措施,传统的极端主义理论政策难以应对和解决新的带有国际性的社会问题,这就促使西方国家探索新的道路,即“第三条道路”^[26]。

由于各国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不同,“第三条道路”主张被接受和付诸实施的程度存在差异,“第三条道路”具体运作方式、实际运作效果与发展前景也存在一定不同,从而形成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不同模式。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迈尔指出,如同20世纪资本主义在欧洲分化成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一样,由于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经验,现在形成的不是一条“第三条道路”,而是若干条“第三条道路”。布莱尔也指出,“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并没有唯一的蓝图。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把“第三条道路”划分为不同的模式^[27]。

克林顿任总统以后,跳出长期极端化思想与政策的争论,不再争论政府大小而力求提高政府效率,不再强求政府应该做什么而着眼于政府怎么做,不再纠缠政府征税多少而讲究适当征税、花钱得体,不再辩论政府办事的动机而看重政府办事的后果^[28]。克林顿指出,“我们的政策既不是随便的,也不是保守的;既不是共和党的,也不是民主党的。我们的政策是新的,是与以往不同的,……是介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的第三条道路^[29]。”美国学者凯恩指出,“美国的社会保护制度是一种公共和私人制度安排的混合体,福利社会改革最有希望的方向是采取一种能够把不同的社会生活方面整合到一种新的富有成效的相互关系中的政策,这是向福利社会转变的观念基础,将社会政策中统制式和支柱式的方法整合起来,正是第三条道路要探索完成的任务,也是美国民主党所要完成的任务^[30]。”

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出制定社会保障改革方案时必须坚持的六条原则:(1)制度变革不能改革退休或行将退休人员的给付水平;(2)全部社会保障盈余不能挪作他用;(3)不能提高社会保障税;(4)政府不能将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股市;(5)新制度必须保留伤残和遗属保障项目;(6)新制度应包括个人控制的、自愿的个人退休账户,以便增大社会保障安全网^[31]。显然,小布什力图做到既不损害公众的利益,又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既要提高效率,又力求公平,这正是“第三条道路”的基本特色。

法国的若斯潘认为,社会发展道路是各式各样的,没有必要去深究这些方式的属性,为解决就业、产品竞争力、经济增长等问题,政府应当放开企业资本,甚至实行私有化。但在出售国有企业股权时,法国政府尽量避免使用“私有化”一词,而以“开放资本”表述其政策。在社会福利方面,法国政府注意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处理好财富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关系,在坚持福利国家基本原则的同时,将国家干预和社会责任协调起来。若斯潘政府推行“年轻人就业计划”,同时在制定其他社会政策方面尽量考虑贫困阶层的利益,减少社会不公平。若斯潘的“第三条道路”政策并未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法国著名政治理论家本沙德就指出,“布莱尔唱出了‘激进中派’的调子,当时还是意大利总理的普罗迪谈到了‘世界性的橄榄树联盟’,克林顿则兴高采烈地注意到第三条道路正在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在所有这种征服现代性的氛围中,法国的若斯潘政府则显

得落伍了点^[32]。”2002年法国左翼政党在大选中失败,此后,对若斯潘“第三条道路”的批评更加尖锐。有些学者指出“若斯潘执政期间在私有化、社会福利、失业政策等问题上处处向新自由主义妥协,在有关劳资双方利益的政策上表现得进退失据,给人以勉强维持现状、不顾选民意愿的印象。”法国人甚至认为,左翼政党落选实质上是其所奉行的“第三条道路”政策的全面失败^[33]。

施罗德更是当代德国“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支持者和实践者。在吸收其他西方各国“第三条道路”思想和主张的基础上,施罗德逐步形成自己的“第三条道路”主张,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倡左右道路之间的妥协。早在1995年夏天,施罗德作为社会民主党经济问题的发言人时就曾经指出:“不必对社民党的和保守派的经济政策加以区分,而是要对现代的和非现代的经济政策做出区分^[34]。”他认为“长期以来引起人们愤怒的不是什么左的或右的经济政策,而只能是正确的或错误的经济政策^[35]。”第二,强调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施罗德认为,战后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模式正面临严重危机,不重新考虑既得的社会福利,就不能推行现代化的社会政策。对社会保障体制进行结构性改革尤为重要。他指出“必须保持最低的福利标准。……关于目前的养老金水平是否必须保持不变,我表示怀疑。”他还提出,退休制度和老龄化问题已经严重地威胁现行以再分配为主要特征的养老金制度,要采用资本化的养老基金制度取代现行再分配性的养老金制度^[36]。只有加快改革进程,才能长久地保持德国的福利制度,才能使德国不落后于国际社会^[37]。第三,强调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个人责任。施罗德指出,目前正是社会民主党制定一个“社会方案”的时候,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在未来如何实现公正、参与、互助和创新;如何塑造一个值得人们在其中生活的社会,不排斥任何人并且使所有的人最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和能力。现代公民社会的核心在于实现更多的以公益为目标的自我负责。必须把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和目标结合起来^[38]。他认为“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者要把社会保障网从一种权利变为通向自我负责的跳板^[39]。”第四,强调社会公正。施罗德指出:“我们要填平我们社会中的鸿沟。我们要所有的人都有工作并过上富裕的生活。我们把自己看成是强者和弱者团结互助的共同体^[40]。”他还提出“正因为实现和维护全面的社会公正始终是社会民主党政策的最高目的,因此,我们再也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分配的公正上。在知识和信息社会里起决定作用的,首先是实现机会公正^[41]。”

五、结语

“第三条道路”思潮在20世纪初的英国社会早已有之并具有显著的政治性,20世纪30年代以麦克米伦的思想为代表的“中间道路”思想有所发展,并十分关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艾哈德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理论是“第三条道路”的典型代表,将“第三条道路”思潮推进一步,在“属于大众的福利”和“来自竞争的福利”的口号声中,“第三条道路”思潮成为社会福利领域的重要思潮;20世纪末,以吉登斯为代表的英国“第三条道路”思潮开始凸显,成为影响西方20世纪末以来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潮。“积极福利”“社会投资型国家”等概念极大地影响了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的“第二代福利思想”。克林顿、若斯潘和施罗德等的社会福利思想主张也表明,“第三条道路”社会福利思想扩展并影响到大部分主要西方国家。

“第三条道路”社会福利思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产生直接的影响,这一思想主张较之同时期具有主导作用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福利思想主张,更具有社会适应性。其主要目标是修正社会福利制度实施中的极端国家制度化或者过分自由市场化,以建立起体现国家、企业与个人共同责任,政府、市场、家庭和个人共同义务的社会福利制度。正因为此,“第三条道路”社会福利思想在以新自由主义作为主导思想的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进程中很快兴盛起来,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取代新自由主义成为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基本思想理论基础,并对大部分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乃至全球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 [1] Jane R. The Unionist Social Reform Committee, 1911-1914: Wets before the Deluge [J]. The Historical Journal, 1987, 30(2): 391-413.
- [2][3] Vic G. Modern Thinkers on Welfare [M]. London: Prentice Hall/Harvester Wheatsheaf, 1995: 49-50, 62.
- [4][5] 周茂荣.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改革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142, 5.
- [6][7][8][9][10][11][12][13][14][15] 艾哈德. 大众的福利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5: 122-128, 57, 183, 184, 183-185, 187, 1-3, 188, 192, 165-169.
- [16][17][18] 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17, 132, 132.
- [19][20][21][22][23][24][25] 布莱尔. 新英国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167, 55, 167-168, 170-172, 349, 159, 208.
- [26][32] 杨雪东. “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6, 143.
- [27] 丁建定. 社会福利思想 [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9: 198.
- [28] 奥斯本. 改革政府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4.
- [29] 傅殷才, 文建东. 凯恩斯主义复兴与克林顿经济学 [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1): 22-28.
- [30] 陶正付. “21 世纪的挑战与第三条道路”国际研讨会综述 [J]. 国外社会科学, 2001(1): 85-88.
- [31] 李珍, 刘子兰. 小布什社会保障改革思路评析 [J]. 经济学动态, 2002(7): 7-11.
- [33] 周穗明. 全球化、“第三条道路”与 2002 年法国大选——当前西方政治右倾化走向分析 [J]. 国际经济评论, 2002(4): 36-39.
- [34][36] 张慧君. 施罗德与新自由主义 [J]. 国外理论动态, 1999(6): 3-5.
- [35][40] 王宏伟. 浅析施罗德的“新中派政策” [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3): 83-85.
- [37] 郭小沙. 看施罗德如何走出地雷阵——解读 3 月 14 日德国政府声明 [J]. 德国研究, 2003(3): 4-8.
- [38][41] 殷叙彝. 施罗德、吉登斯谈公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 [J]. 国外理论动态, 2000(11): 20-22.
- [39] 殷桐生. 施罗德的“新中派”经济政策 [J]. 国际论坛, 2001(4): 71-76.

Development of Social Welfare Thoughts of "The Third Way"

DING Jianding PEI Mohan

Abstract: "The Third Way" thoughts appear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of the United Kingdom, developed in Germany in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flourished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ffected most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Although there are country-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ird Wa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western countries, it advocates abandoning the traditional single extreme conservative or radical policy choice, carrying out the harmonious policy choice between the two choices, and emphasizing the combination of limited state intervention and limited market regulation, the balance among state responsibil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in social welfare,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social welfare leve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Social welfare thoughts of "The Third Way"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reform of social welfare system in most western countries and even the global social welfare system.

Key words: "Third Way", social market economy, positive welfare, second-generation benefits

(责任编辑: H)